

教牧閱讀錦囊

梁家麟

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知識不斷發展，新的觀念和理論此起彼繼，層出不窮，新書籍的出版更是目不暇接，成千累萬。作為一個高輸出行業的從業員，教牧同工在應付日常繁重的牧會工作之餘，必須追上知識進步的急遽步伐；即使不假裝自己是通天曉，不妄想成為每個學科的專家，也需要知道一些對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理論的脈絡梗概。無論如何，不斷學習是教牧同工責無旁貸的事，他們不能以事奉繁忙為藉口，拒絕將閱讀擺在每天日程表的前列；他不能為了使今天能有更多的時間及精力去工作，而以賠上未來有效的事奉為代價。

許多教牧同工表示，他們看到吸收新知識的重要性，但苦於沒有時間恆常逛書店，故難以知道在自己的專業以外，哪些書是值得購買和閱讀的。這個新闢的專欄正是為此而設。筆者會介紹一些近年來出版的中外書籍，當然以中、英文為主，其中有一些是關於聖經和神學的，但筆者會特意選擇一些屬於基督教信仰以外學科的書籍，如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管理學等——只要我相信它們與香港教牧同工的生活和工作相關。筆者涉獵的範圍頗為有限，惟作為一個「書痴」，

每天在書堆裡打轉，也薄有一點名聲，這個有限的介紹，敢信可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首先介紹兩本跟社會時事有關的著作。其一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著的《李光耀回憶錄(1923-1865)》(台北：世界書局，1998)。這本書記述李光耀從出生、成長、出洋留學、回國參政、投身馬來亞獨立運動，到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自立的詳盡經過。內容豐富，枝葉繁茂，情節曲折，教人不忍釋卷。就算我們過去對東南亞歷史認識不深，還是可以跟隨作者的筆觸，神馳於二次大戰後亞洲殖民地尋求脫離英國獨立的種種歷程，從而對這頁與亞洲人切身相關的歷史有初步的認識。本書當然跟基督教信仰扯不上關係，但李光耀對時人時事一針見血的分析，尤其對共產主義的本質及共產黨人的處事手法之評論(如頁300)，卻叫人拍案叫絕，並可以借古喻今地應用在我們今天的處境上。

其二是前港督彭定康所著的《東方與西方》(蔡雄先等譯。台北：時報文化，1998)。要是前一本書曾引起馬來西亞政府的不滿，則這本書所產生的爭議便更大。如彭氏在前言所指，本書並非他的回憶錄，雖然在第一部分他也簡單地憶述在香港幾年的一些治理經驗，為他所布置用以針對中國的種種政策辯護；但全書最主要的部分卻是陳述他的政治見解，特別是批判所謂亞洲價值觀與撻伐中共政權。他旗幟鮮明地高舉民主自由為全球標準，然後大玩全有抑或全無的邏輯推論，不斷責問現實中的香港及中國為甚麼不可以即時實現民主與自由的理想，為甚麼我們要向某個文化與社會的傳統妥協？為何要向某個曾犯下彌天巨錯的政權讓步？如此簡單清晰的辯論策略，加上他一向能言善道，辭鋒銳利，的確教對手難以答辯。對於只求理念一貫的人，任何現實主義者皆不可能有理論上的牢固立足處。筆者對於作者那種為生民

立命的白種人救世主情懷並無甚麼好感，但相信這本書可以有助我們認識香港的歷史與現實，特別是在思路上完全師承於他的民主派。這是教牧同工不應錯過的論著。

接著，讓筆者簡單介紹一本有關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書：美國耶魯大學著名中國史家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 的《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這書的英文原著早於八十年代初便已問世，但歷史著作的時限性較寬鬆，故它的價值並未隨著兩個年代過去而失效。

這本中國近代史著的記述範圍從晚清公車上書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共整整一百年的時間。作者沒有將重點放在政治事件或主要的政治人物之上，卻從這個時期內，不同的知識分子如何理解和回應時代的轉變入手，讓我們看到個人如何受時代影響，又如何影響時代。這些人物包括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魯迅、沈從文、秋瑾、陳獨秀、梁漱溟、徐志摩、王實味、瞿秋白、聞一多、丁玲、胡也頻、老舍等。作者運用大量歷史材料，復原這些知識分子在各個不同處境中的心路歷程與具體行動。作者把這許多人物的事蹟經剪裁後交替鋪陳，展現出同一個時期不同人物的不同回應，製造出立體動態的效果，寫作難度相當高，讀來饒富趣味。要是我們喜歡閱讀歷史著作，特別欲突破政治史或大事記的框框來了解過去的面貌，這本書肯定不容錯過。

下面兩本是有關領袖訓練與管理學的。其一是柯維 (Stephen R. Covey) 的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New York: Fireside, 1990) (中譯本：柯維著，關淑馨譯：《與成功有約——全面造就自己》〔台北：天下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這本書其實早在九年前問世，英文版已銷售

了超過一千萬冊，影響非常大，但很抱歉，筆者才剛讀完不久。作者首先指出，在第一次大戰後，有關教導人如何取得成功的著述的取向，多數由傳統式的教導人完善個人性格（所謂性格倫理，Character Ethics），一改而為教導人如何修整個人態度、人際技巧（他稱之為個性倫理，Personality Ethics）。前者強調內在生命的整治，正心誠意；後者注重的是改善對己對人的觀點態度，和待人處事的手段技巧。他認為這樣的轉向是不幸的，亦不可能為人帶來真正的成功。一個人若沒有處理好內在生命中的負面性格，再樂觀正面的個人形象也是無濟於事的；任憑我們如何懂得在人群中扮演角色，社交技巧高超，出入自如，若我們的人格並不完整，無法真誠待己待人，這樣的角色扮演至終難以讓我們賺得長期的友誼。因此成功必須由內而外，先整治好個人的性格，實現私人革命，才有外在成功（公眾革命）的可能。

作者稱他的思路，是要發展一個有中心原則、強調性格改造、由內而外的個人及人際成功的方法 (principle-centered, character-based, "inside-out" approach to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effectiveness)。他提出建立七個習慣，頭三個是關於個人成功之道的，第四至第六個則是關於人際成功之道的。就個人成功之道而言，他主張我們必須：（一）成為主動進取的人 (Be Proactive)，以意志來改善個人性格，也改善外在環境；認識自己的關懷圈子 (Circle of Concern) 較影響圈子 (Circle of Influence) 為大，但要努力擴大影響圈子。（二）在思想上首先確定目標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為自己撰寫個人的使命宣言，清楚知道人生目標。（三）先做必須先做的事 (Put First Things First)，擬定先後次序，不要被緊急的事纏累，專注於重要的事，在日常工作中採取主動，一步一步的實現計劃。

就人際成功之道而言，他提出：（四）有雙贏的想法 (Think Win/Win)，期望與人的溝通合作是使雙方都得益，而非你死我活；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富裕的心態 (Abundance Mentality)，確認資源無限，成功機會與途徑取之不竭，如此便可以別人的成功為樂。（五）先求了解人，後求被了解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設身處地的了解別人的處境和需要，不要推己及人（他稱為 Autobiographical Responses）。（六）合作增效 (Synergize)，為他人及組織賦予能力，使其有效發揮，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相異處，努力達致兩個人合作比兩個個人獨力所加起來的效果為大的理想。

最後一個習慣是（七）恆常鍛練 (Sharpen the Saw)。他將人生分為生理、心理、靈性與社會四個層次，主張每個層次都得勤加鍛練，不斷進步，不斷注入活力；在求取更多金蛋的同時，保養好那隻金鵝。柯維是一個摩門教徒，雖然他沒有刻意傳教，但在他的著述裡，我們卻清楚看到他引用了許多基督教信仰的觀念。這是一本我們可視為整合信仰與處世之道的領袖訓練的作品。

其二是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 的 *Post-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杜拉克是世界級的管理學專家與社會分析家，他的自傳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剛出版不久。他的著作等身，當中有許多都具頗大影響力，這裡介紹的是1993年出版的一本關乎社會動向分析的作品。

Post-Capitalist Society 不同於大多數亂扯一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後學」，作者也不是在對未來做某種臆測推想，而是對業已存在卻不大為人覺察到的現象，作一個精闢的診斷。他所說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早在二次大戰後便已開始成形，現今已是已發展國家的實況。他指出，人類近

代經歷了三場重要的革命：先是在十七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將知識引進入大規模的工業生產，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然後是十九世紀的生產量革命 (Productivity Revolution)，將工人階級提升至中產階級，從而消弭了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矛盾對立；最後是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的管理革命 (Management Revolution)，徹底改變了傳統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態，並開始了後資本主義社會。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徵是，傳統資本家與工人階級逐漸淡出社會舞台，產業工人在整個社會的工作人口比例愈來愈低（香港也有相同的情況，藍領階層愈來愈少），而生產的控制權亦不再是掌握在一小撮資本家手上，卻是由一群專業的受薪管理人員所領導。此外，傳統所重視的土地、工人與資本，已不再是生產最重要的條件，反倒知識才是生產的最基本原素。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充任公私營機構的僱員，運用他們自己具有的生產工具（知識），創造龐大的生產力。如今社會已不再以僱主與僱員、藍領與白領來分層，卻主要分成知識工人與服務工人。知識工人主宰了後資本主義社會。

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出現了重大的改變，社會、國家乃至國際關係亦隨之而變化。首先，以民族國家作為基本單位的政治體制面臨內外雙重的挑戰。內在挑戰來自部落主義 (Tribalism)，就是一個國家裡不同的種族社群要求分裂；外在挑戰則是國際主義和地區主義，人類面對的許多問題，已非單一國家所能解決，必須結集跨國力量來處理。政府的功能亦要隨之變化，大政府的理念已被證明為無效，政府必須大幅削減其無所不管的經濟與社會功能，將自己定位為決策者，而把大多數任務分判出去，交由社會組織來承擔。

杜拉克非常看重社會組織 (organizations)，就是一些具有特殊使命職能的群體與體制，他相信社會愈益分化的需要只能由這些為數無限多的專業社會組織來承擔。他有幾本書討論非牟利組織的功能和管理。對他而言，教會也是社會組織之一。

在本書裡，他也提到生產與管理模式的轉變、學校職能的轉變，及如何建立一個曉得繼續學習而事實上又不斷學習的受教育人士 (educated people)。

最後一本書是關乎基督教會的：克拉普 (Rodney Clapp) 的 *A Peculiar People: The Church as Culture in a Post-Christian Society* (Downers Grove: IVP, 1996)。作者指出我們現正處於一個後基督教的時代，基督徒在主流文化和社會中，被視為多餘無用的一群，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基督教已被淪為輔導心理學。他指出，歸根究柢的問題是我們從第四世紀開始，便把基督教套入君士坦丁的文化體系裡，形成他所稱的君士坦丁主義 (Constantinianism)。基督徒以為他們可以主宰主流社會和文化，其實不過是在主流文化中扮演若干被派定的角色，他們必須接受主流文化不容置疑的優先性；如此，基督教再不能擁有一套與主流文化相抗衡的異質文化，她只能在主流文化面前調校自己的處應態度，產生如尼布爾所說的五種基督與文化的可能關係。

君士坦丁主義有兩種進路：其一是完全接受主流社會的政治理想與參政手法，在其中尋求基督教的參與角色，此進路不可避免的後果是將基督教大幅度的世俗化，放棄她獨有的身分與使命。其二是在主流文化的邊緣經營一個自留地，將信仰私人化和內在化，也就是將基督教抽離於現實人生之外，成為諾斯底式的宗教。這是今天西方基督教的現況，福音派並沒有例外。

作者主張基督教必須擺脫君士坦丁主義的模式，脫離主流文化，確認自己就是一套異於世界的獨特文化。信仰不是純粹內在和私人的，卻是有鮮明的政治含義在其中。惟有我們不肯以順從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參政，才能真正發揮基督信仰內貫的政治影響力。

明顯地，這是一個重洗派的政治觀點，作者亦不諱言他受尤達 (John Howard Yoder) 等的思想影響甚深。不過，筆者相信它是最合符聖經原則的教會處世之道。特別是在香港由作為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殖民地，回歸成非基督教亞洲地區的一員，基督教回復其少數宗教的身分的時候，克拉普的分析建言實在是暮鼓晨鐘，值得我們深思。